

· 专题研究 ·

从潜流到激流：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与行动

王建伟

内容提要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左翼思潮的发端以北方左联的成立为标志。九一八事变引发国难危机后,在北平特定的区域环境与政治空间中,在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的感召下,左翼思潮不断上扬。1935 年起日本侵华进程提速,华北陷入危局,左翼思潮持续发酵,“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左翼思潮是一种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思想形态和精神状态,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出对国民党统治秩序的批判态度和激进的行为模式,并与抗日救亡潮流汇合。其世界观以及在此支配下的斗争实践,都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北平政治和文化面貌不可或缺的重要拼图。

关键词 北平 左翼思潮 北方左联 “一二·九”运动

作者 王建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对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思想史、文化史的关注较多集中在学院派知识精英、京派作家等群体身上,在许多研究者的笔下,这段时期的北平主要作为自由主义重镇而存在。^①另一方面,“文化古城”概念也在一段时间内奠定了北平历史的叙事基调。^②这些研究都有比较坚实的逻辑基础与史料支撑,但正如 1932 年上海《社会新闻》的观察:“故都春梦中的北平,本来是谜一般的都市,一方面有遗老,王公,古物,宫殿等等封建古典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有共产党,学潮,社会思想,大洋楼等等的时代产物在茁张。”^③当时的北平除了古风流韵与学院内的优雅气息之外,还有一股非常强劲的思想形态值得关注,即左翼思潮的兴起,并与抗日救亡洪流结合,呈现出

^① 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许纪霖等《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6—347 页;刘超《战前十年知识界脉象发微——基于两种谱系的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李蕾《北平文化生态(1928—1937)与京派作家的归趋》,《中国文学研究》2009 年第 4 期。

^②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1—11 页。

^③ 曼贞:《北平的“警察”“学生”和“报纸”》,《社会新闻》第 1 卷第 30 期,1932 年 12 月 30 日,第 589 页。

故都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另一种历史图景。^①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思潮是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当时各方都承认,青年思想的“左翼化”已经是不可讳言的事实。^② 从全国范围考察,左翼思潮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根源。具体到北平,又与特定的地理位置、政治传统、文化环境等息息相关,与华北时局有更紧密的关联互动。国民党在北方地区的虚弱统治为北平左翼思潮的萌发提供了空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不断退让引发广大青年的强烈不满,民族主义勃兴,是引燃左翼思潮的重要导火索。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组织敏锐捕捉到了这一时代脉搏,以左翼文化运动为基本依托,将抗日救亡运动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相结合,不断丰富左翼思潮的内容与形态。

北平的左翼思潮主张打破现状,强调对既存政治与文化统治秩序的质疑与反抗,表现出批判性的思维模式与激进的行为特征。左翼思潮在北平发轫之初,尚属历史表层下的一股“潜流”,伴随日本侵华危机加剧而一路上扬,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与推动下,逐渐由“思潮”转化为“行动”,汇聚成时代“激流”,最终促动了“一二·九”运动的大爆发。北平左翼思潮呈现“地下”与“半地下”交织的状态,展示了旺盛的民族意识、强韧而蓬勃的生命力,以及昂扬的精神面貌,为当时处于苦闷、挫折、无力状态的年轻人提供了重要的人生道路选项。本文尝试进入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社会情境之中,重点探解左翼思潮的外部环境、呈现方式、流通条件、传播路径以及最终走向等问题,力争对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北平的文化面貌有更加全面的体认。

一、北方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治与文学产生的密切关联,二者如影随形,互为因果。当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以残酷的流血方式落幕之际,很多知识青年的政治信仰崩塌,思想上烦闷,精神上困顿。当他们发现无法通过政治方式寻求解决之路的时候,文学再次成为释放这种情绪的重要通道与出口。成仿吾曾评论说:“革命运动停顿了,革命文学运动的空气却高涨了起来。”^③ 鲁迅在解析革命文学在上海的兴起时也提到:“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④ 这种观察同样适合北平。一批青年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纾解内心愤懑,或以文艺运动为掩护,反抗国民党的政治与文化统治,实现个人抱负。^⑤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受此影响,同年9月18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以下简称“北方左联”)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社联”)同时在北平大

^①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参见马俊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小报与故都革命文艺青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2009年;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199页;欧阳军喜《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裴植《1928—1937年北平青年左翼倾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年;王翠艳《探寻左翼文学运动的“北平路径”与“北平经验”——北平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巴蜀书社2021年版,第300—311页。

^② 参见张太原《从思想发现历史:重寻“五四”以后的中国》,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67—414页;卢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兴盛原因再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第1页。

^④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

^⑤ 伍启元在1933年对“革命文学”作出比较精当的概括:“它的立脚点,是‘普罗列塔利亚’(即无产阶级);它的哲学上的根据,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它的目的,是在揭破支配阶级的罪恶;它的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宣传’;它的态度,是积极的,是富于反抗性的;它的内容,是充满着热诚的……它的产生,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104页。

学法学院成立。^① 以此为标志,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登场。之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北平世界语者同盟、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等相继成立。

北方左翼文化的兴起首先是政治环境激发的产物,同时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息息相关。从共产党方面考虑,国民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促使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但对于城市,共产党人并未放弃,而是根据城市工作的条件和特点,寻找新的斗争方式。共产党先前在城市中主要是组织工人罢工,或发动武装起义。此时,则转入思想文化这一阵地,在上海、北平等地,通过组建文化团体,紧紧抓住知识青年群体,发动了一场左翼文化运动,这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国民党发起的另一种进攻。^②

北方左联成立之初选出的第一届执委会一共由九人组成,除段雪笙与潘训(潘漠华)为共产党员之外,其余大多为大学、中学的在校学生。^③ 不管是领导机构,还是盟员,专业作家很少,知名作家更少,有些人甚至因在文学功底上的自卑而不愿意加入。一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虽对左翼文化运动表示同情,但一般不会站在前线,更不会公开露面。盟员陆万美回顾说:“北平从事专业创作的人本来不多,‘五四’前后的老一辈作家,大都在大学任职,生活比较优裕而安定,要求革命、愿意参加冒风险的实际斗争的就更少”,当时的活跃分子多数是青年教师、学生。^④ 曾担任北方左联党团组织部长的冯毅之指出:“当时参加左联,文学喜爱和成就虽是条件,却不是主要条件,主要条件是敢于革命、敢于斗争,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领导的关门主义和‘左’倾思想,又放弃了‘合法’和‘半合法’的斗争方式,那些有地位有名望的文人,就是思想进步,对我们也是敬而远之。”^⑤

这样的人员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方左联缺乏有效的组织力量去扶植年轻人的成长,盟员们的创作热情也未能长久维持,更没有催生出比较成熟的文学样式与艺术作品。当事人杨纤如认为,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毕竟有限,即使写出来了一些作品也无法发表,盟员写作兴致不高,“工作重心就转移到政治工作方面了”。他们直接走上街头,冲上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到了后来,左联盟员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作性质没有什么区别;与其他革命团体如社联、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成员的工作性质也没有什么区别,“担负的革命任务相同,承担的风险也一样”。^⑥

北方左联的这种转向实际上是主观与客观因素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它虽以“文化同盟”命名,但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机构,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定位与使命,本质上还是一个从事政治斗争的革命团体。北方左联成立宣言对此有明确表述,“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样地是以一定的阶级意识为出发点,现社会决无没有阶级意识的任何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势必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底一翼”!^⑦ 后来北平文化总联盟机关刊物《大众文化》也在创刊号上强调,无产阶级文化的中心任务“应该努力成为无产阶级及被压迫大众参加这些政治斗

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主要活动时间为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后来还曾短期存在过一个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组织,简称“北平左联”。这两个团体都以推动左翼文化运动为主要职责,人员有交叉,开展的活动也比较类似。由于处在地下秘密状态,很多左翼团体的组织形式都比较松散,人员也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即使是一些亲历者也无法掌握全部信息。因此在很多当事人的回忆中,存在“北方左联”与“北平左联”两种说法混用的情形。本文为行文方便,统一称“北方左联”,资料引文则保持原貌。

② 参见谢荫明、刘亚军《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③ 谢冰莹,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张璋,辅仁大学化学系学生;梁冰,北京大学心理系学生;刘尊棋,燕京大学学生;郑吟涛,身份不明确;张郁棠,燕京大学学生;杨子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生。参见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4 辑,第 220—222 页。

④ 陆万美:《迎着敌人的刺刀坚持战斗的“北平左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 1 辑,第 18 页。

⑤ 冯毅之:《北平左联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54 页。

⑥ 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4 辑,第 224 页。

⑦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1930 年 9 月 8 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46 页。

争的一件精锐武器”。^①即使是文学创作,北方左联也受中共文艺政策的直接影响,往往主题先行,如宣传保卫苏区,拥护工农红军等。可以说,北方左联是通过“文化”或“思想”的方式实现政治目标,文学创作只是一种工具或是手段,政治色彩和政治斗争占有更加重要的比重,因此具有“半政党”性质。^②

北方左联这种鲜明的政治属性也决定了盟员的行动模式。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特别强调,“左联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群众组织”,“在进行文化工作时,必须严厉反对借口文化运动而规避斗争的右倾危险(即将文化运动与阶级斗争脱离的危险),要使同志明白,文化运动也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部战线,在文运中不但要求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更要使自身成为一种斗争——争文化活动自由的斗争”。^③在北方左联的安排下,盟员需要经常参加游行集会、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等任务,尤其是在一些革命的纪念日,这样的活动会更多,如五一、五三、五四、五七、五卅等。冯毅之回忆:“每逢五月,称为红色五月,同志们又紧张又兴奋又担心,都得做好被捕坐牢和牺牲的准备。”^④

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左联将是否积极参与游行示威,散发标语、传单等秘密行动作为检验盟员是否具有革命性,是否忠于无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当时一些人已经对此提出了疑问。陆万美曾公开提出,左联不宜只搞政治活动,应该多用文艺武器和理论武器,多写文艺作品,出版公开刊物,宣传革命。但是这一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文艺至上主义”,受到内部批判。^⑤

北方左联另一项引发较大争议的是“飞行集会”。其具体做法是,由10—20人组成一个活动单位,预先约定好集会时间、地点;在开会之前,分散隐蔽在会场周围;等时间一到,突然发出一个信号,从四面八方迅速聚拢,立即散发传单标语,呼喊革命口号,诸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武装保卫苏联”“红军万岁”等。活动时间多则半小时,少则几分钟十几钟,然后四散而去。这种方式最初使用几次,是必要的,也是有效果的,“国民党不是说把共产党杀光了吗?叫人民看看:共产党还在,而且继续领导革命。对人民来说,是唤醒觉悟的号角,对革命青年来说,是鼓舞战斗的兴奋剂。可是频繁举行,牵强节日,意义就不突出了。日久普通市民感觉絮烦,青年习以为常也就无刺激可言了”。^⑥更严重的是,“每集会一次,一定有许多人被捕,党的力量就这样被摧残完了”。^⑦

很多参与者后来都进行了反思,曾负责北方左联理论部工作的李正文提到:“听众并不欣赏我们这一套,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则认为‘共产党胡闹’,立即躲开。当时北平老百姓,把我们称为‘闹学生’。事不过三,后来老百姓一看是‘闹学生’就敬而远之,回避了,对我们大感兴趣的,却是那些头戴礼帽,身穿香云纱衣裤的国民党特务,他们开始是驱散队伍,后来见了就抓。”^⑧冯毅之也指出,飞行集会除了冒险暴露身份,并无好的作用和影响。他还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当时对革命形势的估计和工作方法出了偏差:“盲目乐观,把革命看得极容易……当时在同志们谈话

① 信一:《目前政治危机与左翼文化斗争》(1932年5月1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126页。

② 冯毅之:《北平左联回忆》,《左联回忆录》下,第553页。

③ 《中共北方局关于左联和文化运动等问题给保属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8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1—42页。

④ 冯毅之:《北平左联回忆》,《左联回忆录》下,第554页。

⑤ 李正文:《回忆“北平左联”与“北平社联”》,《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14页。

⑥ 杨纤如:《寿南北两“左联”六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⑦ 杨述:《一二九漫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27页。

⑧ 李正文:《回忆“北平左联”与“北平社联”》,《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13—414页。

中,曾幼稚可笑地担心和忧虑,管理北平市的大权若一旦掌握在我们手中,那怎么办?能不能管理好?!”^①

编辑、传播左翼刊物是北平左翼团体的重要任务。他们出版了《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社会科学》《艺术信号》《文化新闻》《新大众》《北方青年》《文艺小报》《冰流》《新诗》《文学前线》《科学新闻》《北平美术》等。这些刊物主要有两个出口:一部分内部消化,如北平文化总联盟就经常采取伪装方式,将一些刊物秘密送到各加盟团体;另一部分则流入东安市场、西安市场、青云阁等书店、书摊以及一些学校门房进行售卖,“出售这种刊物自然有被查抄的风险,但是一来进步刊物受青年学生欢迎,销售很快,有利可图;二来发行者先不向经售者收款,事后算帐,所以书商很乐意经售,发行量很大”。^②

书商为追求利润,自有其生存策略。他们“不敢把革命的书刊放在书架上,但是却巧妙地藏在书柜里,专供熟人或是老主顾购买。特务搜查的时候,他们能悄悄地暂时运走。因为这些书极受读者欢迎,销路大、获利多,所以一些小书商虽然冒着危险却乐于暗中推销”。^③有盟员回忆,西单的书摊小贩们比较精明,他们会观察买书人举动,如果某个客户的眼光落在进步的书和期刊上,不停地翻阅这些杂志、书籍,他们就会“偷偷地从秘密的地方拿出被禁的革命书”向客户推销,其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④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市场上流通的左翼书籍,许多亲历者多次提及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两家商场各有两三家小书店,半公开地出售禁书,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这些书都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长江书局秘密出版发行。^⑤东单附近一家日本人开设的东亚书店也出现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那里可以得到一些日文的马列主义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化介绍。北海附近的国立图书馆和某些大学图书馆,可以看到莫斯科的英文版的《国际通讯》。^⑥

北平左翼团体越来越讲究传播策略,北平剧联主办的《血腥》杂志的更名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据当事人杜如薪回忆,该刊最初以《血腥》命名,意图是要唤醒人民,“让人民看看东北人民被屠杀的惨状,让东北人民的血腥味去刺刺人们的感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发表的文章“就是血淋淋的揭露”,“表现手法也多是自然主义的赤裸裸的暴露”。当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容易产生“盲动和冒险”后,就改变策略,更名为《血星》,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它却通过斗争的实践,经历了一段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⑦此外,一些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通过巧妙包装或改头换面得以出版,有些宣传唯物史观的图书“却要冠上哲学二字以广招徕”。^⑧

从创作实绩看,北平左翼文学最终达到的艺术水准是有限的,这是一个被比较普遍接受的结论,即使很多亲身参与者也很少否认这一点。左翼文学社团泡沫社成员刘曼生(谷牧)后来回忆:“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当时的作品是不太成熟的,而且在找到党组织之前,有的作品带有赚稿费糊口的性质,所以我并未积极支持学者编我的文学作品集。”^⑨左翼团体、清华大学文学会学生陈落

① 冯毅之:《北平左联回忆》,《左联回忆录》下,第 554 页。

② 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4 辑,第 224 页。

③ 陈北鸥:《回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的艰苦斗争》,《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4 辑,第 237 页。

④ 冯毅之:《北平左联回忆》,《左联回忆录》下,第 556 页。

⑤ 于伶:《北平左联到剧联的回忆》,《左联回忆录》下,第 565 页。

⑥ 陈辛仁:《北平左联支部的一年》,《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 期,第 72—73 页。

⑦ 杜如薪:《〈血星〉高照》,《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 382 页。

⑧ 佳冰:《再论新唯物论》,《北平晨报》,1933 年 5 月 23 日,第 12 版。

⑨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 页。

也认为:“那时候出版的刊物,特点是革命热情高,内容密切反映当时的现实矛盾,有时代气息;缺点是理论文章不多,创作一般不大成熟,而且没有经济基础,没有长远计划,出一期算一期,即使没有查禁也很难继续办下去。”^①

但从政治史与思想史视野考察,左翼文化运动与北平社会发生了密切关联与互动,许多盟员更加认同作为“革命者”的政治身份,政治热情明显压制了文艺热情。杨纤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回忆时就坦陈,相对于中国左联的显著创作成果,北方左联在“这方面收获是不大的”,“我们几乎大部分工作都投入政治方面……如果说‘北方左联’专搞政治活动‘不务正业’也不为过份”。但是针对外界关于“左翼作家作品粗糙不文”的评论,他也表达了鲜明的观点:“倘使没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文学的呼声,‘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如此安定平稳地走下去,可能产生一批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致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得以短期的无忧无虑。事情是左翼作家不允许这样办!青年文艺爱好者不允许这样办!……激动人心上进,呼唤奋起急追潮流,打破思想苦闷,激起对旧时代、反动统治者的愤恨感情,算不算得时代精神的美呢?”^②

文化与政治紧密结合,构成了这一时期北平左翼思潮的最显著特征。北方左联一直非常强调革命实践,开展的很多活动都远远超越单纯的文化性质,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与抗争意味,他们的目标是既要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又要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人,一批左翼文化人最终也投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实践,这是北平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区别。如潘训、端木蕻良等人都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于1933年在张家口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抵抗日军侵略。因此,北方左翼文化运动也被视为整个华北抗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艺术创作成就固然有限,但对于那些对文艺或政治饱含热情的青年而言,仍旧起到了吸纳聚合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培养了一批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力量。北方左联通过在北平师大、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朝阳大学、平大法商学院及一些中学设立直属小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支部,将其作为拓展组织力量的重要方式。小组的活动主要包括讨论创作作品以及参加实际斗争等。各小组开会时,北方左联经常选派执委参加。这些小组往往还有外围社团,一般以文艺研究会、读书会等名义存在。许多青年先进入这些社团,然后再加入左联、社联、剧联等,有时甚至一人同时兼有两三种身份。中国共产党首先从这些社团中发现挖掘积极分子,然后吸收入党,这也是北方左联存在的重要意义。^③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历经多次严重破坏,但仍可依靠这些外围组织生生不息,展示出共产党人独特的斗争方式与生存逻辑。

二、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左翼思潮与民族主义的汇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几个小时后侵占沈阳,随后进攻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沦陷。中国丧失大片国土,国人为之震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情绪,迅速蔓延。^④多地民众群情沸腾,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与救亡宣传运动。青年学生走在前列,通过各

① 陈落:《北方左联解散前后回忆点滴》,《左联回忆录》下,第651页。

② 杨纤如:《寿南北两“左联”六秩》,《左联纪念集:1930—1990》,第29—30页。

③ 北平市公安局也明确认定,北方左联与北平社联均为中共地下党的两个团体,并密切关注两个团体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校的内部动向。参见《北平市共党活动情形调查表》(1931年6月),《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630—637页。

④ 陶希圣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之思潮只有一个问题:“如何使国家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对抗民族敌人之要求,超过一切内部纠纷”。参见陶希圣《青年思想之动向》,《现代青年》第7卷第3期,1937年5月15日,第4—5页。

种形式的请愿示威,抨击“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奋起抗日,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均超过以往。

相对于上海、南京等地而言,北平是身处“国防第一线上的故都”^①,地理位置与政治身份都比较特殊,受九一八事变的冲击更加直接,各校学生对“国破山河在”的感受也更加敏感。1931 年 9 月 19 日,“北平大学法学院、东北学生会、市立师范、新东北学会及各大大学均组织抗日会,讨论息争抗日办法”。^②清华大学学生会也于同日成立“抗日救国会”。9 月 21 日,北京大学学生会抗日运动委员会成立。燕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学生抗日委员会以及“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并要求全体同学臂缠书有“耻”字的黑纱。^③北平学生不仅在校内成立抗日团体,9 月 24 日,校际联合性质的“北平各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北京大学成立,并开始筹划南下国都请愿、示威。11 月 28 日,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最先组织学生赴南京请愿。^④从 12 月 1 日开始,北京大学示威团共计 300 多人分两批乘火车南下。出发之前,已经组织罢课,并起草“告民众书”,将矛头直指南京中央政府。^⑤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学生群体逐渐形成了“学生万能”的观念。^⑥这种倾向在北京尤其明显。杨纤如回忆说,由于当时学生敢于猛冲猛打,有“丘九”之称,因为有枪便是力的“兵”是天不怕地不怕,兵字被拆开为丘八,以之代兵;而敢于造反的学生则是不怕鬼不怕,所以排行“丘九”。^⑦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北平的高校数量以及学生人数继续增长,学生力量进一步壮大,并在此次南下示威团中得到了验证。1931 年 12 月 5 日,北京大学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附近游行,与卫戍司令部军警发生冲突,180 余人被捕,次日被强行遣返北平。^⑧

1931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北平各校学生示威团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15 日再赴外交部与中央党部。《申报》报道,示威团“手执红旗帜,左臂缚红布,胸前佩红布条,口呼各种反动口号”,先到外交部,“潜入部内,将在各办公室内之玻璃器具文件及汽车,均被捣毁一空。外部职员见情势不佳,即纷纷由墙垣逃避,但已有数人被木棍殴打,身受重伤”。随后,示威团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先将大门封闭,并将中央党部岗警五人之枪械缴出”,“时中央委员正在举行临时会议,比推蔡元培陈铭枢委员出见。蔡陈二氏到达二门,即闻呼打之声。蔡氏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并以木棍猛击陈氏头颅,陈氏当即昏厥倒地。时中央党部之职员及警卫,见学生动武,即上前救护蔡陈二氏,但学生中即拔出手枪开放,用木棍向内殴打,并绑架蔡氏向门外冲出。中央党部警卫至此向天空开放空枪示威,并追出营救蔡氏”。^⑨当时在场的国民政府委员邵元冲在日记中也记下了这一幕,所述情形与《申报》报道基本一致。^⑩

1931 年 12 月 17 日,北平南下学生再次和南京、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学生举行联合大示威,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冲入《中央日报》报社。国民政府出动军警,在珍珠桥附近对学生进行镇压。

① 茜芊:《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李达》,《世界日报》,1935 年 1 月 28 日,第 7 版。

② 《平市民气激昂》,《申报》,1931 年 9 月 20 日,第 3 张第 11 版。

③ 《全市学界齐起救亡》,《华北日报》,1931 年 9 月 22 日,第 6 版;《全市学生参加今日之市民大会》,《华北日报》,1931 年 9 月 28 日,第 6 版。

④ 《燕大请愿团昨日赴京》,《世界日报》,1931 年 11 月 29 日,第 7 版。

⑤ 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第 1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4—384 页。

⑥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版,第 419—436 页。

⑦ 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4 辑,第 219 页。

⑧ 《北大示威团一部昨晚返平》,天津《大公报》,1931 年 12 月 10 日,第 3 版。

⑨ 《平学生示威团大闹中央党部》,《申报》,1931 年 12 月 16 日,第 3 版。据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的钱昌照记载,示威团到外交部时,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出来会见,但有学生向王正廷掷墨水瓶。参见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32 页。

⑩ 王仰清、许映湖整理:《邵元冲日记》中,1931 年 12 月 15 日,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04—805 页。

这次北平学生南下请愿活动是当时全国学生请愿活动的一部分。相对于上海等地而言,北平学生的情绪以及行为都更加激进,同时在群体内部还夹杂着不同政治派别的相互竞争。^①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勃兴,直接助推北平左翼思潮的高涨。《国闻周报》曾评论说,“民二十年以后,随着国难的爆发,青年人痛感到外患的威胁,同时也痛感到屈辱退让的苦闷”,“五年以来,在学生大会中最受人欢迎的是激烈的言论,右倾的言论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一切群众组织都把握在左倾分子的手里,右倾的势力几乎微弱得可怜”。^② 九一八事变初起时,正在山西太原读书的赵宗复“以为不过如中国古代所说的蛮族的侵略一般的一个国耻而已。读外边杂志所说‘九一八’的危险性的文章等,认为是过甚其辞”。但他在1932年到了北平之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北平东交民巷,外国军警雄赳赳,气昂昂,踱来踱去。中国人经过这条街时,自行车不许响铃,洋车不许按喇叭。军人不能武装通过。哈德门大街旁边,外国军队在练操;朝阳门外,美国兵、日本兵在打野操,枪声炮声,通宵齐鸣。甚至日本兵白昼在王府井大街演习巷战,我听了,我看了,我流泪了!”^③

东北籍学生王汝梅(黄华)的经历更能说明九一八事变对他们这一批青年学生的人生影响。当时他正在锦州的东北交通大学读书,和同学每天看着东北军官兵乘一列列火车经锦州退入山海关内,“痛心疾首,愤懑已极”。日本占领锦州后,王汝梅随一批东北学生流亡到北平,后来考入燕京大学。这批流亡学生“背井离乡,身受漂泊流浪之痛苦,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情绪非常强烈”。他们由于思想接近、境遇接近,往来密切,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讨论华北形势,构成了北平一股非常重要的左翼力量。^④

九一八引发的国难危机为北平的左翼思潮注入了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31年11月20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师吴其昌与其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一同绝食请愿,誓言抗日,并到南京“哭谒中山陵”,在陵前宣读《昭告总理文》:“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誓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⑤

1932年初,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吴晗写信给胡适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还补充道:“过去四个月,无时无刻不被这种苦痛所蹂躏。最初的克制方法,是把自己深藏在图书馆中,但是一出了馆门,就仍被袭击。”^⑥

当时清华园里另一位学子夏鼐虽然一直专心读书,但也无法完全置身局于身外,心底经常抒发“国难当前,书生已成废物”的感慨。^⑦ 政治思想偏右的何炳棣1934年进入清华,“自始我级即受空

① 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第67—87页。

② 田光程:《最近学生界的严重问题:青年思想上的冲突,忧患,与挽救》,《国闻周报》第14卷第4期,1937年1月18日,第9页。

③ 赵宗复:《给》,原载《进山十周年纪念特刊》(1932年),《赵宗复文集》编写组编:《赵宗复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④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⑤ 吴令华编:《吴其昌文集·诗词文在》,三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

⑥ 《吴晗致胡适》(1932年1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3页。

⑦ 夏鼐:《夏鼐日记》第1卷,1933年1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前国难沉重的精神压迫,隆重的开学典礼就是在九一八三周年前一日举行的。梅贻琦校长致词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忍痛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遇即满足自乐”。^①事实上,不管出自何种政治立场,九一八引发的紧迫感、危机感都是广泛而深刻的,给国人带来的创痛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消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政治倾向的差异并不影响对于国难的屈辱感受。

九一八事变在引燃民族危机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北平文化界,“这万象蛰伏的古老北平,由九一八事变之后,已成为各种不同主张的战场”,其中既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还有“资本主义文化的形影,以及社会主义思维的根芽”。^②对于北平的左翼文化团体而言,九一八后如同被注入“一种更烈的药剂”,据报道:“左翼文化运动在北平,正日益开展着。各社团在扩大组织,深入理论斗争,提高政治水平,加强阶级成分,均有很大进步。北平反帝同盟、左联均已建立数个工人支部,左联工农兵通信员数量亦大有增加。”^③

中国共产党也要求北平所有的左翼文化团体都要加入反帝大同盟。在 1931 年底平津学生的“南下示威”运动中,北方左联盟员积极参与,他们根据在南京的经历创作出一批小说和报告文学,“从南京回来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空前活跃,不仅组织扩大了,盟员增加了,活动也更广泛了”。^④北方左联的两份机关报《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刊,鲁迅、郑振铎、朱自清等都有文章在上面刊登,在北方文坛引起了关注。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刊不能使用北方左联的名义,而是以文学杂志社与文艺月报社的名义,由西北书店和立达书局发行,因此也不曾刊载左联的文件和宣言。

北方左联不仅扩大了各支部,还组织了新的文学团体,一些高校出版了新的铅印刊物。南京《青年战线》就注意到,九一八之后的北平,“青年学子感情所趋,于是大发议论”,“讲演,请愿,示威的运动,大杂志,小刊物,无疑的是打破他以前的纪录了,比之小报盛行的上海,也不能说在其下”。^⑤对于北平文化界的这种趋向,一份在上海发行的《小日报》有更细致的观察:“当南方的取缔左倾思想唱得正出动的当儿,那知北方的共党分子,正是大活其动的时候”,“那些左倾分子,在学校里,居然有公开的演讲、公开的刊物,任何的团体里,都有他们的分子。而且北地因地理关系,大部分都是血气刚强,好于争斗,所以这些左倾分子,真是难于应付”。^⑥

陶希圣曾总结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件以及 1933 年初的长城抗战,“刺戟青年思想界,实大而且深,且由此种刺戟,遂使思想方向一度转换”。^⑦这一“转换”即指一批青年群体将目光转向现实政治。1932 年 5 月,为了加强各团体的联合,北平文化总联盟成立。其内部设有党团,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化委员会的领导,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三、北平政治环境的趋紧与左翼思潮表现方式的变化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左翼思潮一方面受日本侵华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华北区域特定的

①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6 页。

② 蜀兰:《北平文化阵线》,《实报半月刊》第 22 期,1936 年 11 月 16 日,第 34 页。

③ 《对垒中的北平文艺 新的文化深入大众》,《文艺新闻》,1932 年 5 月 16 日,第 2 版。

④ 陈沂:《1931—1932 年的北方左翼文化活动——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和请示》,《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4 辑,第 207 页。

⑤ 冯希衡:《北平左倾刊物一瞥——北平文化通信》,南京《青年战线》第 6 期,1933 年 1 月 21 日,第 12—13 页。

⑥ 寒水:《北平思想界之左倾》,《小日报》,1932 年 8 月 16 日,第 2 版。

⑦ 陶希圣:《中国最近之思想界》,《四十年代》第 6 卷第 3 期,1935 年 9 月 15 日,第 8 页。

政治环境息息相关。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北平之初,确立的只是名义上的统治,阎锡山、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先后成为北平实际的控制者,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错综复杂,为北平左翼思潮留下了生长的缝隙。^① 杨纤如记述说,当时平津正处于阎锡山统治下,“而阎冯正联合反蒋,整日军阀混战不已,你死我活,自顾不暇,抽不出手来压迫革命活动,而且也还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不是不想反革命,而是暂时顾不上……所以当时除上海租界内可以游行示威而外,只有北平还有条件干这个行动”。^② 李正文也描述,张学良对于北平学生的活动“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不干涉态度”,因此,他们的活动“差不多是半公开的”。当时北平的地下党“十天或半个月就搞一次游行示威”。^③ 左翼学者侯外庐也称,张学良对北平学生运动采取的是一种有保留的干预态度,“不论组织集会,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只要限于学校范围内,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自由。即使有时把人抓去,也会较快地释放”。^④

1933年1月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不久之后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辞职,南京国民政府在北平设立军事委员会分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分会委员长。5月31日《塘沽协定》签署之后,中日暂时达成妥协。国民党中央军队开始深入华北腹地,对北平的掌控能力明显增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监管也更加严密。蒋介石以维护治安为名义,调派中央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其侄蒋孝先担任负责人,同时兼任北平宪兵副司令。作为特务机构,宪兵三团可以跨越警察系统直接采取行动,北平政治气氛明显紧张起来,“宪兵第三团来北京以前,军警当然也反共,但还很少紧跟紧追地抓人。宪兵第三团来了以后,情况就大变了”。^⑤ 许多左翼人士对此印象深刻,“国民党的宪兵第三团,对北方的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来说,是一个血腥的名字”。^⑥

侯外庐回忆,自从宪兵三团进入后,“北平的上空阴云密布,全城完全笼罩在法西斯恐怖之中”。蒋孝先“秘密地派大批特务布置在各个大学的周围,每当学生们有集会活动,就倾巢出动,横加破坏;或派特务伪装混进学校,暗中监视师生的活动,包括教学活动。特务巡视教室走廊的情况,便是发生在此时期。当时,有些大学的门房也被收买,成了监视革命师生进出的暗哨。宪兵特务闯进学生宿舍、教员家里,以至在街头巷口,随便抓人捕人,已是司空见惯”。^⑦ 1934年8月,担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范文澜因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被宪兵第三团逮捕并押送南京,后经蔡元培和北京各大学校长以及一些教授联名营救,才于1935年1月初被释放。^⑧

当时北平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有几起所谓《反共启事》或《悔过自新书》之类报道”。^⑨ 即使清华大学这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城外高校也渗入了国民党的便衣队伍,在校学生赵俪生记述:“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就驻扎在北平,他们的便衣侦探就混在我们食堂里跟我们邻桌吃饭。只要在你枕头下找到一本绥拉菲莫微支的《铁流》,就够叫你被捕了。假如再搜出来《1925—1927 中国大革命史(简略本)》或者《清算立三路线》小册子,那么,你就被认为是正宗正派的‘共党’了。”^⑩

① 王健伟:《从“边城”到“危城”——“故都”时期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学术研究》2020年第7期,第118—127页。

② 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辑,第219页。

③ 李正文:《回忆“北平左联”与“北平社联”》,《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12页。

④ 侯外庐:《韧的追求》,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

⑤ 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⑥ 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第41页。

⑦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41页。

⑧ 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中国青年》第3卷第2期,1940年12月5日,第68页。

⑨ 李正文:《“北平左联”时期的理论斗争》,《左联纪念集:1930—1990》,第164页。

⑩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在此背景下,中共北平市委遭受严重破坏,“原有各区区委,文化工作委员会,平反(即北平反帝会)工联,互济会,党报委员会,以至市委之机关,十九均被破获”。^① 共产党改变工作方式,主要借助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简称“武卫会”)、反帝大同盟、北方左联、北平社联等开展活动。这些组织触角比较广泛,通过在大学、中学以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名义设立支部,并注意与原有的一些左翼学生社团联合,构建起一条“左翼之网”。后来担任北平临时市委负责人的彭涛曾对这一情况总结说:“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时,北平党的组织相当大,但是没有合法的群众组织作外围,党员经常到街上游行、演说,一行动就暴露。”在此之后,共产党逐渐调整策略,因此,“党的组织不大,但与群众有联系”。^②

彭涛与另一位共产党人谷景生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他们都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二人从军队回到北平后,都与上级党组织暂时失去联系,但仍不失革命热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一些左翼社团,物色积极分子,积聚革命力量,从中发展党团员。谷景生后来担任北平文化总联盟和北方左联的党团书记,同时还主持左翼外围刊物《泡沫》,该刊在北平市政府社会局登记,属于合法刊物。东北流亡学生谷牧在刊物上发表了《海上的斗争》《剿匪》等作品,被谷景生发展,先加入北方左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③

面对政治空间的不断收缩,北方左联被迫完全转入地下,活动方式也更加隐秘,“盟友须严格遵守组织生活制度。编为若干小组,每组由三人或四人组成,较大的组也不得超过七人,都各自分散地进行活动。开会的地址临时通知,由联系人负责。个人的住址,基本上是保密的,不轻易告诉他人。各小组也不发生横的联系,遇事须通过‘左联’执委会分别通知”。^④ 左翼人士受到的管制越来越严格,“一时北平城头乌云盖天,白色恐怖铺地,大批青年或被捕或逃亡,昔年各大、中学附近,革命青年穿梭来往景象,再也不见了”。^⑤ 对于左翼刊物,尤其是一些左翼组织主办的机关刊物,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要求下,北平市公安局加大侦查力度。^⑥ 《文学杂志》《文艺月报》《艺术信号》《水流半月刊》《科学新闻》等先后被查禁。^⑦

有研究者统计 1927—1937 年间北平各大学的文学社团,在 45 个社团中基本上可判定属左翼性质的有 29 个,占到 64%。^⑧ 抛开这些社团的文艺创作不谈,仅从政治功能、组织形式、动员能力等方面考察,正是它们的存在有效聚合了一批左翼青年。其骨干成员多为青年学生,没有明显的政党属性,与中共党组织的关系若即若离。由于大多分布在学校当中,北平地方当局如果要采取行动,通常先需和学校层面沟通,或者将任务先行派往学校,由学校代为处置办理。由于压力层层传导,也产生了逐级递减效应。一些担任社团负责人的共产党员即使被捕,也不会轻易暴露真实身份,往往是作为激进学运分子被处置,遭遇的审查强度和标准与真正的地下党员并不一致。因此,这种社团身份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正是左翼社团的广泛存在,使得北平地下党组织虽遭多次破坏,但与左翼青年之间的联系纽带没有被完全斩断。一旦遇到合适契机,即能通过这些团体迅速集结动员,爆发巨大的集体力量。

① 天:《北平 CP 新设特委》,《社会新闻》第 4 卷第 25 期,1933 年 9 月 15 日,第 390 页。

② 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 34 期,1985 年 11 月,第 31 页。

③ 谷景生:《回忆“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地下党》,《党的文献》2001 年第 2 期,第 75—76 页。

④ 石嘴冲:《忆“北平左联”》,《左联纪念集:1930—1990》,第 205 页。

⑤ 杨纤如:《北方左联作家孙席珍事略》,《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 3 期,第 148 页。

⑥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关于查禁〈北平文化〉的密令》(1933 年 8 月),《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 644 页。

⑦ 《北平禁左倾向》,《兴华》第 30 卷第 48 期,1933 年 12 月 13 日,第 41—42 页。

⑧ 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7—1937》,第 192 页。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校园弥漫着浓郁的左翼氛围。^①由于地处北平西郊,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清华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学生运动的重要基地。1931年国民党一份关于北平中共活动的调查表就表明,“清华大学,亦为共党最活动的地方。城市的消息不稳妥,他们的机关即迁至清华,在校的嫌疑分子约有卅名”。^②

1933年至1934年,清华大学先后出现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现代座谈会等学生社团,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后来担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就是参加了这些组织之后,开始研读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籍,思想上得到武装,逐渐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③据1934年下半年进入清华读书的魏慕一(韦君宜)回忆,现代座谈会可以在校园公开招收会员,她在会内与蒋南翔编在哲学组,一起学习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书籍。此时,她并不知道蒋南翔就是共产党,“更不知道有毛泽东其人”。^④

当时,北方左联在清华设有小组,主要领头人是外语系赵德尊与中文系陈落,赵俪生、王瑶、韦君宜等人是骨干成员,对外则以国防文艺社、清华文学会的名义在校园内公开活动。^⑤《清华周刊》被左派学生掌握,蒋南翔当选为总编辑,姚克广、杨德基(杨述)、赵德尊等担任编辑或撰稿人,发表大量时事报道、评论,展示出日趋鲜明的左翼色彩。1935年3月现代座谈会解散之后,徐高阮、蒋南翔、姚克广、胡鼎新(胡乔木)、黄诚、高承志等又加入了“武卫会”。

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同处北平西郊,都以“学术自由”为保护伞,尤其是燕京大学作为一所具有优越学习和生活条件的教会大学,虽在国民政府立案,但国民党官方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课外活动干预较少,为左翼思潮的传播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燕大学生拥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尤其是校内聚集了较多的东北学生,无家可归的心态以及在北平的生活困境使得这一流亡学生群体成为一股重要的不安定力量。

以王汝梅为例,他加入了燕京大学的抗日救国会,曾从北平的东北大学借来武器,组织燕大学生举行军事演习,并制作简易的手榴弹。1935年,王汝梅和同为东北籍的张兆璜分别担任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执行主席与主席。他们发起时事座谈会、东北问题研究会等,讨论华北形势和时事政治。他们还接管《燕大周刊》,自1935年秋季开学后,每期都有文章揭露“何梅协定”“广田三原则”和日本酝酿占领平津的密谋。^⑥《燕大周刊》还组织“抗日问题专号”“法西斯问题专号”等,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在校园内部形成了浓烈的抗日宣传攻势,刊物风格较之前明显转向,“不必怕打破了桃花源里享乐者的绮梦,仅可以攻击他们没落的生活。不必怕自己的父兄或老师是教徒,仅可把宗教的咖啡性妥协性呈献出来。同时将社会上一般生活的痛苦描写出来,作个对比。这该是一种叫人看了有打寒噤的清醒的文章”。^⑦

① 有论者认为,1928年清华改制为国立大学之后,学生活动逐渐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年龄较大,当时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很高,尤其是文法科系毕业生,在校多有前途茫茫之感。同时,日本加紧侵略,激起巨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学生深受刺激,不论出身贫富,思想多呈左倾。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4页。

② 《北平市共党活动情形调查表》(1931年6月),《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636页。

③ 蒋南翔:《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编:《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3—1174页。

④ 韦君宜:《他走给我看了做人的路——忆蒋南翔》,《思痛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4—247页。

⑤ 赵俪生:《记清华园“左联”小组和“清华文学会”》,《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第247页。

⑥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第7页。

⑦ 冀新:《燕大周刊的前途》,《燕大周刊》第6卷第5期,1935年11月8日,第36页。

四、“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左翼思潮的“沸点”

1933 年 5 月《塘沽协定》的签署,虽使中日一度紧张对峙的局面得到暂时缓解,但造成的另一后果是华北门户洞开,平津一带的军事防御机制已经基本失效,《大公报》评论说:“五百年来之北京,今日竟成或安东或满洲里。至少言之,亦仿佛三十年来之沈阳,此诚近世未逢之国难。”^①“武卫会”华北分会描述:“现在的华北,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囊中物,他们可以随时探囊,随时取物。华北两万万人民现在都成了笼中鸟釜中鱼转眼就会遭遇到日本强盗的轰炸屠杀。”^②国民党中央军、日军以及华北各地方势力在此展开明暗较量。

进入 1935 年之后,华北局面继续恶化。日本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强调华北“特殊化”,实质上就是使华北彻底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建立“第二个满洲国”。^③蒋介石以国力薄弱为由,对日本侵略行为步步退让。驻防在华北的国民党中央军撤走,北平军分会、北平市党部、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等机构也纷纷退出。一位清华大学学生记录,从山海关一直到天津、北平,“每一处铁路车站或海港码头,都可以看到一面太阳旗,插在那里的派出所上,招呼着源源开来的兵车和货船……北平前门车站上挤满了行李和旅客,像大水前慌忙搬家的一群蚂蚁,这是南下的国民党军队和党部人员的家属。他们腾下位置给‘居留’进来的日本和朝鲜侨民,任凭这些人到处开设料面房、‘俱乐部’,贩卖毒品和枪枝,收买贼赃和拐来的妇女、儿童,窝藏土匪、流氓,组织汉奸、特务”。^④蒋南翔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国民党的要人们纷纷避难离去,故宫的古物络绎南运,许多学校忙着搬家,汉奸横行,谣言蜂起。”他感受到,北方的土地和人民已经被蒋介石政府抛弃,“就如祖上之肉,随时有被敌人侵吞的可能”。^⑤

此时的北平虽然在名义上还是中国领土,但已是一片“异国”景象:“有的是日本天皇的宪兵,有的是投降派汉奸和警察,有的是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有的是日本人和高丽棒子贩卖的鸦片、红丸”,杨述感叹“哪里还象中国地方”?^⑥一位从南方来到华北的青年为此致信《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这环境给我极大的苦楚。我有时烦闷得像胸口塞了一块重铅,有时悲愤得血管像要爆裂……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⑦这种环境给予北平青年强烈的感官刺激,九一八事变后不断积聚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遇到合适的外部条件,很容易便被引燃。

1935 年夏秋期间,连下暴雨,长江、黄河泛滥成灾,冀鲁豫等地的大批灾民涌入北平。此时,中共北平市委已经改组成立了由彭涛、周小舟、谷景生三人组成的北平临时市委,彭涛担任书记。他们利用“武卫会”发动学生举办赈济募捐,并成立北平各校水灾救济联合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以此为基础,11 月 18 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成立。

① 《勉驻平政委会诸委员》,天津《大公报》,1933 年 6 月 17 日,第 1 张第 2 版。

② 《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华北分会筹备会告华北同胞书》(1934 年 8 月 20 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一二九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5—136 页。

③ 参见金冲及《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④ 杨君辰:《“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二九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51 页。

⑤ 蒋南翔:《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战士——杨学诚同志》,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64 页。

⑥ 杨述:《一二九漫语》,第 2 页。

⑦ 《大众信箱(四)》,《大众生活》第 1 卷第 6 期,1935 年 12 月 21 日,第 157 页。

主席由北平女一中教师郭明秋担任,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北平学联成立之后,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共产党人之手。

1935年11月底,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校学生游行请愿,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12月9日清晨,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东北大学、女一中等十几所大中学校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称:“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①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因西直门城门被提前关闭,未能入城,但在城外集合不散,并推举代表向警察交涉。城内各校门口虽有军警戒备,禁止学生集队外出,但仍有六七百人冲出校门,集合于新华门,要求谒见何应钦。因何不在,由侯成与学生代表晤谈。晤谈无果而散后,各学生拟结队向北平市政府请愿,其间与警察发生冲突,学生受伤并被捕多人。后游行队伍又冲至王府井大街,沿途多有学生加入,最后队伍在霞公府被公安局消防队用水龙冲散。^②

当日示威活动结束后,北平学联主席团在北大三院宣布北平各大学、中学从10日起开始罢课,并通电全国,要求各地各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抗议当局无理镇压学运,“一二·九”运动爆发。12月16日,北平学联再次组织北平各校学生,分别从不同方向齐集天桥举行市民大会,要求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权利。这次活动参与的学校与学生人数比9日更多,规模更大,准备更为充分。《中国学生》用一种非常感性的语言形容这场运动:“在一个最尖锐寒冷窒息的气氛中,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民族解放运动爆发了。它像久被压抑着的火山炸裂开,也像野火的展开蔓延着,强烈地燃烧着每一个青年的心,燃烧着每一座古旧的东方建筑物,燃烧着每个灰色的故都。”^③

赵俪生认为,“一二·九”运动因有“民心”和“组织”作为两项重要支持条件才获得成功。只有民心没有组织力不行,只有组织不得民心也不行。所谓“民心”,“就是打日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到“小鬼子欺侮我们太厉害了”,“日本坦克在长安街上开过,日本飞机在天空演习,日本浪人在东单牌楼随意行凶打人”,“胃活”“大学眼药”“仁丹”“味之素”等日货广告到处琳琅满壁。东北被强占,热河被强占,通县也成立了“自治”政府。^④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于光远专门到通县走了一趟,“看到穿着特别颜色和样式的警察,贴着‘中日和善’‘中日经济提携’‘防止赤祸’等标语。到那里去,我有如同出了国那样的心情”,据他在潞河中学的一个熟人说,“师生们过的差不多已经是亡国奴的生活”。^⑤

民族自觉意识是“一二·九”运动爆发的重要条件。在当时北平学生群体中,只有极少数参加了共产党,绝大部分主要是受民族主义的直接感召,愤激于日本侵华。^⑥于光远的经历就很具有代表性。据他自述,“一二·九”之前虽然已经觉悟到自己必须采取革命的活动,但是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没有同当时的政治组织取得联系,因此只能与一些好朋友“自发地干起革命来”,包括工人识字夜校等。不过,他们自己也不能确定这些究竟算不算“革命工作”。那一时期,于光远一方面想投身革命,但不知道怎么“投”法。他当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没有体育和文艺爱好,活动

①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第144页。

② 《北平数校学生昨举行请愿》,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10日,第1张第3版。

③ 敬乡:《一年来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中国学生》第3卷第19—22期合刊,1937年1月6日,第31页。

④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第43页。

⑤ 于光远:《“一二·九”和我——讲讲六十年前我自己的故事》,《平原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19页。

⑥ 欧阳军喜:《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16页。

范围很小。内心虽有革命热情,但没有明显显露出来,不被外人了解,因此一直是在“清华的革命同学的圈子之外”。他对中央苏区有向往,因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而受到鼓舞,但在北平“看不到共产党的活动,连共产党的标语和传单都没有看到”。于光远相信“共产党在北平一定有人,也很可能在清华就有”,但就是看不到,也不知道谁可能是共产党。游行当天,于光远是主动加入队伍的,事先并没有得到通知,与游行队伍里面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没有与人交谈,也没有结识新的朋友。他是在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队之后,才接触到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后来加入民先队,才真正“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中去了”。^①

以上这些出自于光远的晚年回忆文字,他对自己当年的心路历程有详细的披露。另一位清华学生杨学诚因为牺牲较早,没有留下较多的个人记录,但是蒋南翔作为中共清华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曾密切关注过他。据蒋回忆,杨学诚在 1934 年考入清华大学之初,还是一个“埋头功课、对政治并无兴趣的人”,“平时沉默寡言,没有什么锋芒”,是一个安分守己的“正统派”好学生。但随着日本侵华导致的亡国危机,“使素来埋头用功的学诚同志,也不能不卷进动荡不安的政治激流中,再不能毫无感应地‘安心读书’了”。“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杨学诚还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准备也不很充足;他参加救亡运动,是如此的积极热烈,最有力地支持着他的,可说是一腔沸腾的爱国热情”。^②“一二·九”运动后,杨学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 1936 年秋接替蒋南翔担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反抗日本侵略的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反映了民族主义勃兴背景下北平青年的思想转向与人生追求,亦是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左翼思潮发展的“沸点”与高峰。突然爆发的政治热情甚至超出了组织者的事先预估。据彭涛介绍,“一二·九”运动之前,学生运动遭到破坏,学生一度比较沉闷,“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读死书,其实他们心里对局势都很愤慨,由于各种组织教育工作,加上形势一紧张,一号召大家就起来了”,“队伍每到一处总有人参加”,“很多中间学生也参加进来了,甚至落后的也参加”。^③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何兆武对“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也与此呼应,“开头是大学生,北大的、清华的、燕京的、师大的,都是他们在游行,经过一个学校就敲门,中学生就跟着跑,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我们都跟着跑”。^④

赵俪生认为,当时青年的左转倾向不是偶然的。北洋的路走不通,孙中山与蒋介石的道路也走不通,因此只能“另谋出路”。^⑤韦君宜也称,她投身“一二·九”运动主要是受到抗日救亡热情的激发,“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⑥后来担任清华大学民先队队长的李昌也指出,当时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同学虽然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但有些人开始只是激于爱国热情,单纯要求抗日,只是军警特务的水龙大刀才使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破灭了”。^⑦自九一八事变之后,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抗日救亡运动汇流,不断丰富北平左翼思潮的主要内容,而国民政府在面对日方侵略的应对失当与低效则进一步推

① 于光远:《“一二·九”和我——讲讲六十年前我自己的故事》,《平原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第 13、17、18、21 页。

② 蒋南翔:《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战士——杨学诚同志》,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第 164、166 页。

③ 彭涛:《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北京党史资料通讯》第 34 期,1985 年 11 月,第 32、33 页。

④ 何兆武:《上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5 页。

⑤ 赵俪生:《蒿樵堂自叙》,第 38—39 页。

⑥ 韦君宜:《思痛录》,第 4 页。

⑦ 李昌:《回忆民先队》,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第 5 页。

动了青年思想的群体性左转,成为“一二·九”运动发生的重要诱因,最终造成了对国民党统治的离心倾向。

不过,“一二·九”运动能够发生并一直持续下来,并不是左翼思潮自动转化的结果。^①北平地下党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了比较周密的筹划,克服了以往学生运动经常出现的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弊端。^②1935年底的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以及罢课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北平地方当局计划采取提前放假的方式,意图分散学生力量,消解学生队伍。面对国民政府以及北平地方当局的分化,如何继续保持学生的政治热情不消退,保证学生队伍不瓦解,对组织者而言是更大的挑战。在中共北平市委的指导下,北平学联党团以及各校的学生领袖认真思考后续问题,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华北腹地宣传抗日救国,锻炼队伍,实行学生与民众的联合。这一转向虽也有其不得已的缘由,但对于学生思想的转化以及斗争方式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保障了“一二·九”运动持续释放历史能量。^③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下辖四个团,于1936年1月3、4日先后从北平、天津出发,8日在河北固安城外汇合。1月中下旬,南下宣传团受到军警阻拦,被迫返回北平。南下过程中,第一、第二团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团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返回北平后,两个组织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所有宣传团成员都自动转为“民先队”队员,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队”。2月1日,“民先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成立大会。

“民先队”内部设有党团,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学生黄敬担任负责人,总队部成员由中共北平市委指定。他们摒弃了以往比较单一的请愿、罢课与游行示威的形式,采取了更加多样化的斗争手段,如露营、军事训练等,更加注重工作策略。由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已经在1935年停止活动,因此,“民先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青年团的职能,并推动了全国青年的救国运动。据北平市公安局在1936年7月掌握的数据,“民先队”当时已经具有2000余人的规模。^④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在“民先队”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组织了学生军和游击队。南方的青年救国团、抗日先锋队等,也是在“民先队”基础上组织起来的。^⑤

1936年,北平连续爆发几次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主题都是吁请政府抗日。3月31日,北平学联组织学生在北大三院礼堂开追悼会,追悼病死在监狱的北平第十七中学18岁的学生郭清,会后在长安街举行抬棺游行。5月,北平学联改组成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6月13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并声援天津反日示威,北平学生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并继续坚持无限期罢课、罢考。11月15日,日军进攻绥远和察哈尔东部,北平学联号召捐献万件皮衣,发动各校女同学和教职员家属为前线赶制棉衣,并组织 and 派出绥远前线服务团。29军收复百灵庙之后,为支援绥远抗战和反对南京政府迫害上海爱国领袖,12月12日北平学生再次举行大型示威活动。“一二·九”运动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运动,并不局限于1935年底北平学生的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而是掀起了民族

① 苏云峰认为,清华大学九一八救国运动与“一二·九”运动性质并不相同。前者纯粹出于学生的爱国心,学生自动自发,后者深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第168页。

② 孙思白:《“九一八”与“一二九”学生运动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第121页。

③ 关于共产党人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参见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周斌《再论一二九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辽宁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④ 《北平市公安局呈北平市政府文》(1936年7月30日),杨兴民等选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活动的一组史料》,《北京档案》1987年第2期,第28页。

⑤ 李昌:《回忆民先队》,李昌等:《“一二·九”回忆录》,第28—33页。

抗日救亡的浪潮,整个过程持续至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①

“一二·九”运动也对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深化作用。中共北平党组织一方面领导学生运动,另一方面也着手重启一度停顿的左翼文化团体的活动,北方左联、北平社联等逐渐恢复,并与民先队、北平学联等展开协作。一些左联盟员参加了南下宣传团,赵德尊、杨述、陈落、韦君宜、赵俪生、王瑶、赵荣声等人既是北平左翼文化社团的重要成员,同时也积极投身到“一二·九”运动中。很多文艺青年,既是北平学联的骨干,也是北方左联的新生力量。

1936 年 2 月中国左联解散之后不久,北方左联也停止了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停滞,而是反映了中共领导的文化运动在基本策略上的重要转向,其标志就是同年 11 月成立的北平作家协会,部分承接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内容。据当时担任北平作家协会执委的中国大学教授王西彦介绍,北方左联是一个秘密组织,北平作家协会是北方左联的“扩大”,“是文艺界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事前争取了好多位学术界名流参加”,《华北日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新报》等都刊发了该会成立的消息。^②

北平作家协会的构成以青年文艺工作者为主,但也体现出开放姿态。为了纠正宗派主义倾向,扩大文化阵线,除要求北方左联的成员一致参加外,还争取到几位老作家以及一些文学立场并不属于左翼的作家,如陆侃如、冯沅君、张秀亚、卞之琳等。在成立宣言中特别提出文艺从业者要在“联合战线”的号召之下团结起来,作为这伟大运动的一环,“凡是不甘心作亡国奴和汉奸的作家们,纵然文艺上的主张不同,我们也认为同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因为救亡运动是全中国人的共同事业”。^③ 当时年仅 19 岁的胡绳就已经注意到这一趋势。他指出,对于“一二·九”运动之后的文化界而言,各种倾向的文化人已经在“中国民族的生和死”这一大目标前逐渐接近,最终汇聚在“同一的战线”上。^④ 北平文化界及学生团体内部出现了“息争”的呼声,提出“以理智的疏解法消弭彼此摩擦”。^⑤ 北平文化人达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当侵略者加紧进攻的时候,只有侵略者是我们的唯一敌人……在民族解放这最神圣最广大最近切的口号之下,本来的派别恩怨,实在都没有存在的余地。”^⑥ 此时,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整体工作方针相对以往发生明确改变,更加强调建立统一战线,而这也是中共整体革命方略发生重大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⑦

余论

20 世纪 30 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不是一种固定的形态,其主要内容与表现方式、强度随着华北区域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动不断变化,并受到日本侵华进程的直接影响,与上海等地有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北方左联的成立及其开展的文化运动是北平左翼思潮萌发的“根芽”。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政与外交问题的失误处置引发全国民众普遍不满,国难危机持续加剧,北平

① 亲历者冯兰瑞认为,广义的“一二·九”运动系指从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华北危亡在即,北平学生首先在 12 月 9 日爆发了请愿游行斗争,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学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到 193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停止发展为止,历时三年整。参见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 年第 1 期,第 9 页。

② 王西彦:《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 年第 2 期,第 50 页。

③ 《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宣言》,《燕大周刊》第 7 卷第 16 期,1936 年 11 月 28 日,第 24 页。

④ 胡绳:《论近两年来的思想和文化》,上海《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 年 6 月 15 日,第 33 页。

⑤ 曹聚仁:《北平文化界息争运动》,《社会日报》,1937 年 7 月 1 日,第 1 版。

⑥ 白:《北平文化界最近的动态》,《时代文化》第 1 卷第 1 号,1936 年 11 月 17 日,第 7 页。

⑦ 参见唐宝林《刘少奇与一二九运动的转折》,《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肖政军《再论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走向及其成因》,《中共党史研究》2022 年第 3 期。

青年学生多次走上街头,力促政府抗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左翼思潮相结合。另一方面,北平地处华北,不仅与南京国民政府有较远的空间距离,而且与中央的行政关系也比较松散,国民党在北平的存在感一直较弱。多重因素互相叠加,左翼思潮在适宜的环境与土壤中破茧而出,逐渐演化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时代主潮之一。

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左翼思潮,既是一种思想形态与精神状态,也表现为在此思想指导的政治行动实践。北平发达而多元的教育体系为左翼群体提供了相对宽敞的政治空间与生存环境,大学与中学校园是传播左翼思潮的主要通道,青年学生是左翼思潮传播的主要载体,他们通过校园读书会、社团等形式聚集起来,研读、传播左翼(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书籍,初步构建起一套左翼之网。在北平左翼群体中,除极少数为中共地下党员(职业革命家)外,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也包括少量教师,他们没有政党背景,但对国民政府以及北平地方当局的不满是一致的。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北平的思想文化格局呈现非常复合、多元的形态,无法用某种单一的影像独立定格,不同群体在政治地位、知识结构以及观念意识等方面,呈现较大差异。一批带有精英属性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因掌控丰厚的文化资源而占据强势地位,一批前清遗老与北洋旧人也有相对独立的生活世界与交游网络,呈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生活状态,影响仍不可小视。对于左翼思潮而言,最初属于一股潜流,但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在国民党不同派系力量的缝隙中逐渐勃兴,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巨大感召下,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紧密呼应,最终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激流。

进入1935年之后,在日本的加紧策动下,华北呈现半独立状态,国民党中央军政势力基本退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管控几乎呈现真空状态。外在限制减少,激愤与躁动交织造就了危局下的北平城市氛围,也为左翼思潮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助推力。在敌国入侵的巨大阴影之下,革命意识与救亡主题叠加,左翼思潮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与形态。北平共产党人及时捕捉到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时代情绪,组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史与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是对北平左翼力量的一次检阅与淬炼,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北平左翼思潮的总结与升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整个过程表现出较强的组织性、持续性与策略性,其中一大批骨干人员后来奔赴延安。至此,北平青年的政治热情与爱国行动汇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洪流之中,北平的左翼力量投身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深度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历史构建。

(责任编辑:薛刚)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3, 2023

Jian Bozan and the Prelimin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Li Changyin* (4)

Personal Friendship,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s: Reexamining Liu Shipa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Zhang Taiyan

..... *Zhang Zhongmin* (20)

Based on some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u Shipai and Zhang Taiyan through media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era. By tracing the changes in their friendship,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factor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al style of Liu and Zhang. As demonstrated by this article, both Liu and Zha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media and were good at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and cultivating their personal images through media. It can be said that Liu Shipai was competitive and suspicious while Zhang Taiyan cherished talents and was unconventional. Their personal friendship, based on their similar standpoints on certain academic questions, inevitably became something that entertained readers throug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is kind of friendship was strained by changes in China's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time.

From an Undercurrent to a Torrent: Left-wing Ideologies and Movements in Beiping in the 1930s

..... *Wang Jianwei* (33)

O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Commissioner in the Nanji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between 1932 and 1936

..... *Hou Guihong* (51)

Divergent Understandings on the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among Top Kuomintang Elite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 Case Study on Zhu Jiahua

..... *Zhou Donghua* (67)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ll-out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Kuomintang top elites on whether to adopt and how to implement the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on the front lines. Zhu Jiahua first proposed the strategy of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during late November and early December of 1937 when he was transferred from Zhejiang as the governor. In his farewell speech, he advocated pursuing a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with the precondition of protecting the people and their properties. Zhu insisted that the strategy he proposed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of Chiang Kai-shek, but political forces represented by the Guangxi Faction misunderstood and distorted Zhu's proposal by advocating a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featured with purposeful self-inflicted destruction. Before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retreated from Hangzhou, Zhu did what he could to preserve Hangzhou city. On his way to assume a new post in Hubei via Zhejiang, Jiangxi, and Hunan, Zhu explained his views on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in great length, which was not well received by his audience. Only a few Kuomintang high-ranking officials like Wang Jingwei echoed his opinion.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devastated Changsha and the intact Hangzhou could not be more marked after the "Great Fire of Changsha" in 1938. Top Kuomintang elites including Chiang Kai-shek and Chen Cheng started to rethink the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The intellectual and media circles also advocate caution in adopting the "Moscow formula." Since then, both the discus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in China became more rational and cautious. Such a change attested to Zhu Jiahua's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scorched earth resistance strategy.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s, Periodization and Measurement

..... *Du Xuncheng* (85)

The basic development model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y emerged after Western powers forced the Qing government